

# 民居在野

西南少数民族民居  
堂室格局研究

王晖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 民居在野

西南少数民族民居  
堂室格局研究

王晖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民居在野：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堂室格局研究 / 王晖  
著. --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608-6526-3

I. ①民… II. ①王… III. ①少数民族-民居-建筑  
艺术-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1770 号

# 民居在野

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堂室格局研究

The Hall-room Pattern of Southwestern Minorities' Traditional Residence

王 晖 著

责任编辑 袁佳麟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王 晖 张 微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2473)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安兴汇东纸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349 000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6526-3  
定 价 5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绪论	1
第一章 从用火设施看江华瑶族近代以来的汉化	8
第一节 瑶族相关研究及所调研民居的概况	10
第二节 用火设施的类型与变迁	18
第三节 火塘位置与堂屋的空间类型	26
第二章 江华瑶族民居明间的形态变化	30
第一节 明间平面尺度的变化	32
第二节 明间剖面的变化	36
第三节 明间变化的社会学动因	39
第三章 瑶族古民居的堂室格局	42
第一节 瑶族古民居中的“前堂·后室”现象	43
第二节 湖南省以外的瑶族民居	47
第三节 瑶族古民居与文献记载的“前堂后室”之比较	55
第四节 关于瑶族古民居平面形式的讨论	63
第四章 苗、侗、土家、壮族民居相关状况	70
第一节 苗族方言与民居的多样性	71
第二节 南侗的前廊与北侗的堂屋	87
第三节 汉化较深的土家族	100
第四节 壮族的干栏与前堂后室	111

<b>第五章</b>	<b>民族关系与民居形制</b>	124
第一节	各族民居汉化过程的共性与差异	125
第二节	相向而行的苗族与侗族	127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瑶族与壮族民居	132
第四节	瑶族的民族学考察	137
<b>第六章</b>	<b>关于“前堂后室”的文献考证</b>	148
第一节	围绕“前堂后室”形制的历史论争	149
第二节	右房有无的相关考证	154
第三节	关于“一堂二内”	158
<b>第七章</b>	<b>从“前堂后室”到“一明两暗”</b>	164
第一节	早期居住建筑中的堂室格局	165
第二节	“前堂后室”的嬗变与消失	179
第三节	演变机制的推论	194
<b>结 语</b>		199
<b>参考文献</b>		205
<b>图表索引</b>		213
<b>致 谢</b>		219

# 绪论

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民族类型众多，分布广阔且混杂。以各地人口较多的民族而言，云南省境内有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等；贵州省有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等；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四川省和重庆地区有彝族、藏族、羌族、土家族、苗族等；湖南省有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等。另外中部的湖北省主要有土家族和苗族等。

在《中国移民史》中，葛剑雄将我国少数民族分为三种类型：最近几世纪从境外迁入的、自古以来就在当地生存发展的，以及居住区有过较大变化或有过多次迁徙的<sup>①</sup>。上述西南民族中，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大都自先秦以来就在当地生存发展；壮族、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虽然在历史上分布区的范围有过增减，但主要的聚居区没有太大改变；频繁迁徙、居住地有跨越数省的重大变化的要数苗族和瑶族。在西南这些民族中，定居于偏远地带的民族有自成一体、特色鲜明的民居建筑，如傣族的干栏式竹楼、彝族的土掌房、哈尼族的蘑菇房等。而居住地与汉族临近、民族间接触较频繁的苗族、侗族、土家族、壮族等，其民居虽然各有特点，但与汉族相互之间的文化关联性也很突出。后一类民居所承载的民族史、文化交流史方面的信息会更加丰富，因此，本书基于既往的研究和调研成果，重点考察后一类民居的状况。

中国民居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1940—1941年，刘敦桢教授和中国营造学社的诸位学者在避战祸于西南期间，对云南、四川等地的古建筑和古民居进行了考察，撰写了《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一文，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文中首次将民居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类型和研究范畴。同时期刘致平教授也调查了四川的传统民居，写出《四川住宅建筑》文稿，但在抗战期间未能出版，直到1990年才得以收录在《中国居住建筑简史》一书中。

1953年，刘敦桢教授创办了中国建筑研究室，1957年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一书。这本书在对我国居住建筑发展进行概述之后，主要从平面轮廓的角度对各地民居进行了分类解说，是民居研究的开山之作。此书引发了建筑界对民居的研究兴趣，之后《徽州明代住宅》《苏州旧住宅参考图录》和《吉林民居》等著作相继问世。到了20世纪60年代，各地民居的调查测绘工作普遍展开，北至内蒙草原、南至闽粤客家均有研究报告。其中《浙江民居》一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它基于当时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对浙江20余县市进行的调查，对民居的空间处理、体形风貌、地形利用、构造和装修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投入的专

<sup>①</sup> 葛剑雄，等. 中国移民史（第一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90.

业力量之充实、论述之细致乃至制图之精良至今仍值得称道。不过这本著作主要立足于对优秀民居设计经验的借鉴，因此属于纯粹建筑学视野下的研究，对于人文历史、社会背景等较少论及。

20世纪80年代后，民居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台湾、香港地区及国外研究者能够进入国内进行民居调查研究，国际交流得到强化，也推动了国内民居研究的进程。专业的学术团体如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下属的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下属的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下属的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等相继成立，举办多次学术会议并出版文集。3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民居相关的论著，既有《民居建筑》《中国居住建筑简史》《中国民居研究》等总体性研究，也有诸如《窑洞民居》《安徽民居》《云南民居》等以地域性为主题的研究。集成式的丛书如《中国民居建筑》《中国民族建筑》《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等也有问世，另外也有连续出版的包含民居研究索引的《中国民居建筑年鉴》。

海外对中国民居的研究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学者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后，1975年，日方组织的建筑学术考察团首次访问中国。之后的80年代在日本掀起了中国民居的研究热潮，进行了广泛的民居调查，发表了大量论文和著作。京都大学田中淡教授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除《中国建筑史研究》<sup>①</sup>一书外，发表了多篇民居方面的论文，并对《中国住宅概说》等中文著作进行了译介。在《中国住宅的类型》<sup>②</sup>一文中，他尝试从结构形式的角度对中国民居进行了试分类（图0-1），覆盖了境内的各个民族。浅川滋男借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南方民居，出版了《住居的民族建筑学——江南汉族与华南少数民族的住居论》<sup>③</sup>《云南纳西族母系社会的居住样式与建筑技术调查研究》<sup>④</sup>等著作。东京工业大学茶谷正洋教授等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组织了多次“窑洞考察团”，考察范围西至甘肃、东至河南，在研究中采用了量化分析和几何分析方法，系列成果在当时深受瞩目。东京艺术大学茂木计一郎教授等人对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民居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察，出版了《中国民居空间探访》<sup>⑤</sup>《客家民居的世界》<sup>⑥</sup>等著作。大阪工业大学的盐谷寿翁教授等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云南少数民族民居研究，在《日本建筑学会计划系论文集》发表了多篇论文。鹿儿岛大学土田充义教授自90年代开始与湖南大学进行了长期合作研究，涵盖了湖南境内的汉族、苗族、侗族、土家族、瑶族民居，除多篇学术论文以外，集结出版了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湖南省汉族与少数民族民居研究》<sup>⑦</sup>一书。

与过去相比，国内的民居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尤其在基础资料的蓄积方面已有极大

① 田中淡. 中国建筑史の研究 [M]. 东京: 弘文堂, 1989.

② 杉本尚次. 日本のすまいの源流 [M]. 东京: 文化出版局, 1984.

③ 浅川滋男. 住まいの民族建築学——江南漢族と華南少数民族の住居論 [M]. 东京: 建筑资料研究社, 1994.

④ 浅川滋男. 雲南省ナシ族母系社会の居住様式と建築技術に関する調査と研究 [M]. 东京: 丸善书店, 1996.

⑤ 茂木计一郎, 等. 中国民居の空間を探る [M]. 东京: 建筑资料研究社, 1991.

⑥ 茂木计一郎, 等. 客家民居の世界 [M]. 东京: 风土社, 2008.

⑦ 土田充义, 杨慎初. 中国湖南省漢族と少数民族の民家 [M]. 东京: 中央公论美术出版,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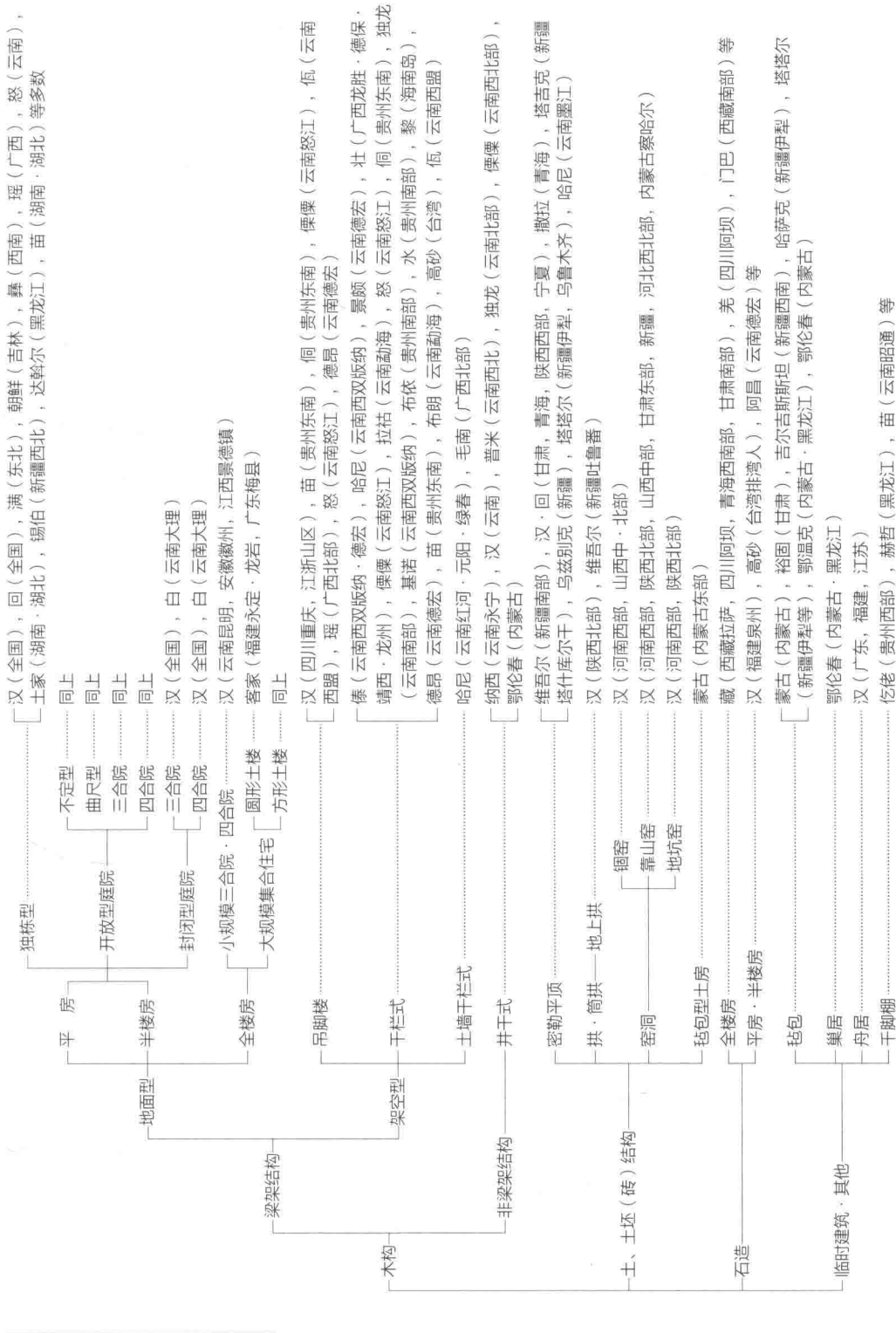


图 0-1 中国民居结构类型的试分类<sup>①</sup>

① 原图载于杉本尚次, 日本のすまいの源流 [M], 东京: 文化出版局, 1984. 转引自茂木计一郎, 等, 中国民居の空間を探索 [M]. 东京: 建筑资料研究社, 1991: 13.



的增长。但是以国外同行的工作为参照，可以看到国内的研究在以下方面还有不足。

在研究视角方面，首先是缺乏生活史方面的视点，主要仍然着眼于对建筑物的“客观”分析，对空间的实际使用方式关注较少，即“见物不见人”。体现在成果上，多局限于平立剖面等一般技术图纸，而缺乏诸如空间分配、室内设施、日常行为方面的调查与分析。其次是缺乏“历史变迁”的视点。民居研究虽说是属于“建筑史”的范畴，但实际上对现状关注较多，对民居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历史渊源方面的探索较少，即“考今不考古”，民居所携带的样式以外的历史信息往往被忽略。

在研究方法上，专业领域的技术讨论较多，而跨学科研究仍然偏少；基于经验和印象的判断较多，而量化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运用较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存在研究者专业化的“学术逻辑”与实际的“营建逻辑”相背离的情况，这与所用的方法有关，例如将某些现代建筑分析方法如空间构成、几何分析等套用在传统民居上带来的问题。这些不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如短期的调研测绘难以进行深入了解生活实态、追溯历史演化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等，另一方面学科专门化所导致的视野局限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民居研究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囿于既有的思想方法，单靠积累资料既无法凝练出有创新性的观点，也无法对宏观的文化研究有所贡献。特别是研究方法的趋同化，例如空间分析方面长期沿袭某种固定的类型化方法，不免让人觉得民居研究日趋僵化呆板，有渐入死胡同之感。

所幸随着基础资料的增加，方法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不少研究不再囿于建筑形态本身，而注重从乡村社会、经济、地域文化乃至人类学、地理学等交叉学科领域出发，对民居进行更为全面的理解和阐释。例如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团队对楠溪江流域村落和民居的研究，除了建筑本体外，从社会学角度对乡村的经济基础、宗族关系等进行了详细考察；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教授团队的系列研究从“民系”的视点出发，结合移民史、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成果，探讨南方民居的形制特点、关联性及其溯源等，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华中科技大学李晓峰教授出版了《乡土建筑——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一书，对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传播学、生态学等交叉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近年来还有不少对民间营造技艺方面所做的研究，以及从生态技术的角度对传统民居的热工性能进行的实测和分析，等等。

笔者最早介入民居研究是在1998年，当时参与了上述湖南大学与日本鹿儿岛大学的民居调查。之后在日本熊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湖南江华瑶族民居为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湖南省江华县瑶族民居研究》<sup>①</sup>。回国后继续进行着民居的调研和空间研究，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比之前有很大拓展。本书既是对过去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对今后研究路径的探索。

迄今为止的民居空间研究多关注以庭院或天井为核心的空间单元及其组合关系，而本书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居主屋的平面形制上，集中考察“堂与室的空间关系”。这个视角是笔者

<sup>①</sup> 王晖. 中国湖南省江华县瑶族民家に関する研究 [D]. (日本)熊本: 熊本大学大学院自然科学研究科, 2005.

在对江华瑶族民居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慢慢浮现出来的。与北方常见的俗称“一明两暗”的堂室格局不同，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堂室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与北方类似的“左中右结构”，也有特殊的“前后型结构”。进一步的考察表明，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民居中，“前后型结构”的存在更为普遍，而且在当地属于较为古老的类型。这种格局上的差异仅从气候和舒适性的角度，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本书集中针对这一问题，从更广泛的时间（历史）和空间（地域）范畴展开研究。

从建筑学本体的角度看，“堂”和“室”是民居中两种最主要的空间。二者的空间关系决定了民居内部的空间特征。二者的形态，尤其是“堂”的空间形态不仅对民居整体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折射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以堂室关系为基础，可以构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民居相互对比的框架，有助于揭示其中的内在规律性与关联性。因此，本书以堂室格局为主线，对涉及的各族民居进行横断式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希望跳出“从形态到形态”的窠臼，把民居空间与形态方面的考察与民族学、文化史结合起来，希望能“知其所以然”。有共时性的地域差异、民族差异对比，也有历时性的历史渊源追溯。在具体论证上，尽可能运用理性和量化的分析方法，将类型分析、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等用于民居研究，减少印象性和形而上学的论断，使研究过程也可以被追踪和检验，研究资料也能构成其他研究的基础。

与上述视角和方法相对应，本书没有按一般先有整体框架和宏观认识、再一一分项论述的方式，而是按照研究工作本身的发展历程，层层深入。具体来说，循着“瑶族的用火设施→瑶族民居明间形态变化→瑶族及其他民族民居的堂室格局→民族关系史视野下的民居形态→历史上居住建筑的主流形制及其演变”的脉络，从小到大，逐渐推进。

本书是由一系列的专题构成的。每个章节试图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并导向下一个问题，经过一个较为连续的推导过程，最终形成对一些宏观问题的看法。各章节的概要如下。

第一章“从用火设施看江华瑶族近代以来的汉化”，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选择了能够清晰表征江华瑶族汉化过程的微观物体——火塘与灶台进行考察。从中既看出在汉族影响下，19世纪以来瑶族生活方式的转变，也能窥见瑶族对自身习惯的坚守。这个考察为江华瑶族建筑形态的演变建立了一个时间上的标尺。

第二章“江华瑶族民居明间<sup>①</sup>的形态变化”，对瑶族民居的明间尺度变化进行了量化研究，把握其形态与功能的变化，并从居住人口变化等社会学角度对其原因进行分析。在理解瑶族近代以来明间形态变化的基础上，导向了瑶族古民居的堂室格局问题。

第三章“瑶族古民居的堂室格局”，聚焦于瑶族古民居的“前堂·后室”现象，首先对其调研村寨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进一步考察了江华以外西南地区（包括泰国、

<sup>①</sup> 各地对于民居主屋正中的开间（《营造法式》称为“当心间”）并无统一称谓，有“明间”“中堂”“正间”等说法，本书为表述方便，统一称为“明间”，相邻两侧开间称为“次间”。

老挝等)瑶族民居的状况。将瑶族古民居格局与文献所记中国早期居住形式“前堂后室”进行初步对比,确认了二者的近似性与差异。在排除了功能性、明确的观念性、地域性影响等各种可能性之后,需要考虑二者具有历史同源关系的可能。

第四章“苗、侗、土家、壮族民居相关状况”,为全面把握客观情况,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了苗族、侗族、土家族、壮族的堂室格局。苗族与瑶族具有同源关系,在湘西苗族民居中可见相对接近的堂室格局以及堂室变迁过程;土家族在较早时期汉化,与目前汉族民居格局接近,地域差异不大;侗族和壮族属于西南土著民族,至今仍以干栏式为特色,其中侗族的堂屋成立较晚,而桂西桂北壮族古民居的居住层平面与“前堂后室”同样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第五章“民族关系与民居形制”,分析了以上各族民居汉化过程的共性,说明在类似历史条件下,居住建筑的发展受同样规律的支配,而其差异性反映了民族基底和外在环境的不同。从苗族和侗族迁移路径和民族关系的角度,分析了黔东南苗族干栏、半干栏民居的特殊形态,认为干栏并非苗族民居的原生形态。针对壮、瑶古民居的类似性,从“进化论”“传播论”的不同角度进行分析,通过不同民族、不同支系之间的横向对比,认为作为迁徙者的瑶族将这种形制带给壮族。无论从族源、历代迁徙、瑶汉关系史,还是从语言学与宗教方面来看,瑶族在诸多方面保留了华夏文明的早期特征,且不同领域的分析都将瑶汉文化交融的高峰指向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六章“关于‘前堂后室’的文献考证”,为准确把握主流居住建筑的早期形制,依据历史文献,对“前堂后室”“一堂二内”等进行了考察。先秦士大夫阶层的住居形制和“明堂”一样,是个千古争讼不绝的问题,本书依据《仪礼》和各代学者的论述进行考证之后做出了判断。而《睡虎地秦简》等文献表明,“一堂二内”应当属于“前堂后室”的简化形态,在秦汉及其之前广泛用于庶民阶层的住居。

第七章“从‘前堂后室’到‘一明两暗’”,在考古发现和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前堂后室的嬗变与消失。原始时期的居住建筑室内无分隔,商周至秦汉时期普遍采用“前堂后室”,在魏晋南北朝开始蜕变,经唐宋的工字形阶段,变为明清时期常见的“一明两暗”(前朝后寝)。平面格局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存在连续的中间状态。以瑶族民居的近代变迁为参照,反推历史上主流格局的演变机制,提出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前堂后室消失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一些南方汉族民居的形态差异,除了地理与气候方面的原因,也可以从上述变迁过程的不同路径和不同阶段方面进行解释。

本书从堂室格局这一视角出发,希望在构建“主流—边缘”的动态关系的基础上,为理解不同民族、地域民居的共性与差异提供一条新的脉络,并对居住建筑的历史演变获得一些新的认识。这也是本书的标题“民居在野”的立意所在。“在野”是与“在朝”相对的概念。历史上曾经的主流形式,随着社会变迁已消失殆尽,而民族迁徙可能将其带入边缘地域而得以长久保存。民居是历史上“低等级”的建筑,但又是最普遍、最日常的建筑形式,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正如摩尔根所说:“住宅建筑本身与家族形态和家庭生活方式有关,它对人类由蒙昧社

会进至文明社会的过程提供了一幅相当全面的写照”<sup>①</sup>。之所以围绕民居主屋的平面格局进行“小题大作”，一定程度上是借鉴了人类学的思想方法，笔者将其称为“只有习惯，没有自然”——那些在特定文化内部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东西其实都有其来由，其中往往隐藏着集体无意识观念或历史的密码，值得深究。但在另一方面，不得不时时警惕避免落入“过度诠释”“以偏概全”的窠臼。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尽可能采用量化分析、统计分析等理性方法，在把握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各种可能性进行论证。

原本从微观现象入手的研究，最终导向了对宏观问题的探讨，这是研究工作自身发展的结果。本书尝试通过多种途径逐步去理解居住建筑史上的一些“大问题”，也提出了理解南方民居形制的一种脉络。也许随着将来研究工作的发展，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推论会被证实或证伪，但笔者更期望提出的一些思路和方法能对民居研究有所帮助。研究中也很多缺憾，特别是少数民族大多没有自己的文字，缺乏内部的文献记载，民族学领域的研究也只能从少数汉文文献和口述中寻觅一鳞半爪，其中几乎不涉及过去的住居情况。历史学讲求现象与史料的互证，在文献基本阙如的情况下，研究中不得不运用逻辑的力量，通过类比法、排除法等展开论证，其中的观点也就不能摈除主观成分。加上成书仓促，不当之处有待方家批评指正，以利于今后认识水平的提高。

在研究过程中，痛感各地古民居消失速度之快，其携带的大量历史信息往往由于人为的拆除破坏而荡然无存，一些历史线索再也无法证实。民居在野，也是一种呼唤，呼唤更多的人既拿起书本，又走出书斋，加入古民居的研究和保护中来。

① (美)摩尔根. 古代社会 [M]. 杨东莼, 马雍, 马巨,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4-5.

伏闻记名所祀之六神，实

尊乎灶。人莫不营于三膳，

亦系乎天。然思平日所为，

未必令人皆是。以今醮官

某人萦缠世俗，养育爱缘，

靖言甑爨以釜鬻，每待水

烹而火饪。燔炙致腥膻之

冲突，炊淘将米谷以抛违。

拖刀拽斧而岂识重轻，

菽草燔柴则宁无稷触。

——「东厨司命灯仪」



# 第一章

## 从用火设施看江华瑶族近代以来的汉化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火塘作为炊事和取暖设施。火塘本身大同小异，大致是约 1m 见方的下沉式坑槽，内设三脚铁架或三块“锅庄石”支撑灶具。然而各族火塘的使用方式及观念有所不同。湘西苗族传统的火塘在堂屋靠近山墙一侧，祭祀时面向火塘，因“苗家祖先在山墙中柱下”<sup>①</sup>；永宁摩梭人将锅庄石作为祖先神位，祭祖又叫祭“锅庄”；新晃侗族民居中有高出地面的架空火铺，单独占据一个房间，待客、取暖、吃饭均在火铺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用火设施与少数民族的生活密切相关，从用火设施出发，见微知著，可以有效地追踪其生活方式的变化过程。

建筑学领域考察用火设施的论著尚不多见。《中国湖南省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民居》<sup>②</sup>的第四章主要考察了湖南省侗族民居，针对民居中的火塘以及厨房的位置进行了论述，将侗族与土家族、苗族及瑶族等做了比较。浅川滋男在《住居的民族建筑学——江南汉族与华南少数民族住居论》<sup>③</sup>中，以“用火设施的汉化”为题，分别介绍了贵州省的汉族、苗族及侗族的厨房空间，并根据侗族民居中厨房的变化论述了“汉化”趋势。浅川将侗族的用火设施根据形态分为以下 4 种模式：①仅设火塘，不设灶台；②灶台放在木地板下；③灶台放在木地板上；④火塘消失，仅有灶台。其中，第四种模式是理论上的推测，浅川考察的侗族民居中没有实例。另外《苗族传统民居的火塘文化研究》<sup>④</sup>一文，从“人的居所”“社会的居所”“祖灵的居所”三个层面，剖析了湘西苗族火塘的文化人类学意义，并指出待客时的方位座次应是古制的遗存。

本书在进行江华瑶族民居本身的考察之前先考察用火设施，除了用火设施本身的人类学意义以外，还有两个原因。首先，用火设施的改变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改变的一个典型标志，通过用火设施可以清晰阅读出生活史方面的巨大变化，从而为民居在其他方面的变化建立一个时间上的标尺。第二，受时空局限性、案例局限性的约束，对江华瑶族民居的历时性变化的考察，是通过比较同一村落乃至不同村落中不同时期建造的民居的当下状态来完成的。当案例来自不

① 柳肃. 湘西民居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59.

② 土田充义, 杨慎初. 中国湖南省汉族と少数民族の民家 [M]. 东京: 中央公论美术出版, 2003: 170-174.

③ 浅川滋男. 住まいの民族建筑学——江南汉族と华南少数民族の住居論 [M]. 东京: 建筑资料研究社, 1994: 377-383.

④ 汤诗旷. 苗族传统民居的火塘文化研究 [J]. 建筑学报, 2016(2): 89-94.

同村落时，隐含了一个假设，即不同村落的民居在同一历史时期其形貌基本类同。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的有效性需要进行验证。如果此方法在用火设施的考察方面能够获得符合逻辑的结果，那么在其他方面的考察也就有了相应的可信度。也就是说，本章的考察除了问题本身以外，也有在时间标尺上和逻辑方法上夯实基础的意义。

## 第一节 瑶族相关研究及所调研民居的概况

### 一、瑶族概况

据民族史方面的研究，瑶族在秦汉时期属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居住地是现在湖南省的湘江、资江流域和洞庭湖沿岸<sup>①</sup>。瑶族古称“莫徭”，最初的记载见于《梁书·张纘传》：“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随后在《隋书·地理志下》中记载：“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隋唐时期瑶族分布于现在的湖南省和广东省，在洞庭湖流域有大量瑶民。杜甫诗《岁晏行》有“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之句；刘禹锡也有诗作《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连州位于今广东省北部的清远市境内。这些诗歌隐约反映出当时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处的局面。宋代瑶族分布区域扩大到四川、湖北、贵州、广西、广东各省。元朝之后，瑶族继续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分布状况。根据2010年的统计，中国的瑶族人口为285.3万，其中有59.9%在广西壮族自治区（171万），24.7%在湖南省（70.5万），7.1%在广东省（20.3万），6.6%在云南省（19万），1.4%在贵州省（4.4万）。

从地理上看，瑶族主要聚居于南岭<sup>②</sup>山区，如：广东的乳源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广西的富川瑶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等。至于一些瑶族自治乡更是星罗棋布，以至于广西境内南岭的一条余脉就叫大瑶山。

江华县位于湖南省南端（图1-1），与广东、广西两省毗邻。江华是湖南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同时也是全国13个瑶族自治县中瑶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2010年江华县共有人口约47.9万，其中瑶族约28.6万，约占全县总人口的60%，占全国瑶族总人口的10%。根据《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志》，瑶族最迟在元代大德九年（1305年）已经在江华境内居住，目前多数瑶族村民自称是从相邻的广西省迁入<sup>③</sup>。

瑶族中存在许多支族，根据居住地和服饰等的区别，分为“过山瑶”“平地瑶”“红瑶”“蓝靛瑶”等<sup>④</sup>。历史上“过山瑶”长期保持着本民族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在一处耕种几年，即

①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490。

② 南岭是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山系的总称。狭义的南岭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个山岭，故又称五岭。广义的南岭还包括五岭邻近的苗儿山、海洋山、九嶷山、香花岭、瑶山、九连山等。

③ 湖南省江华县瑶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563。



图 1-1 江华县的位置

迁往另一处，因不断在山间迁徙而得名。“过山瑶”直到 19 世纪才逐渐开始定居生活<sup>①</sup>，而部分群体如东南亚的瑶族直到 20 世纪仍在不断迁徙<sup>②</sup>。与汉化较早的“平地瑶”等相比，更多地保持了瑶族原有的特点。

## 二、瑶族的民族学研究概述

瑶族研究在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近代瑶族研究始于清末民初，当时西方民族学刚刚传入中国。蔡元培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攻读民族学，回国后首次组织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就是关于瑶族的调查。1928 年 2—8 月间，严复礼、商承祚教授到广西凌云县调查了 6 个村寨，出版了《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民族学、人类学泰斗费孝通先生也选择了瑶族作为自己研究生涯的开端。1935 年 10 月，费孝通、王同惠夫妇进入广西大瑶山地区南部，重点对花蓝瑶进行调查，此后费孝通先生特别关注瑶族研究。同时期，徐益棠教授陆续发表了瑶民经济生活与生死习俗等方面的报告。抗日战争时期，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向内地迁徙，部分民族学者有机会接近瑶族地区。当时研究的范围涉及瑶族来源、元代对瑶区的开发、瑶区土地制度、社会组织以及风俗习惯等领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学者对瑶族已有很多关注，研究范围涉及较广，并已采用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综合性方法。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66 年，在政府主导下有组织地开展了大规模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召开了壮瑶族专题学术研讨会。但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因受“左”的思想影响，瑶族研究受到冲击，尤其涉及习俗信仰等问题被列为禁区。“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对于瑶族的研究处

① 胡起望，范宏贵．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 [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

② (泰)差博·卡差·阿南达．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 [M]．谢兆崇，罗宗志，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6-14．



于停顿状态，而同期法国、泰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人类学者关于瑶族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在国际人类学界影响很大。这一时期，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开始了瑶族的专题研究。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文学部1971年编印的《人文学报》发表松本信广的《盘瓠传说资料考》、竹村卓二的《瑶族的姓和村落——种族史资料解说》；日本《上智史学》1972年第17号发表白鸟芳郎的《评皇券牒中所见的盘瓠传说和瑶族的十八神像》，日本《民博通讯》1977年第1号发表竹村卓二的《关于瑶族起源的两个神话》，讲谈社1978年出版白鸟芳郎的《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等。

改革开放以来，在费孝通教授的推动下，瑶族地区的调查研究重新恢复。1980年，根据费孝通的倡议和指导，胡起望、范宏贵对广西大瑶山区的一个村寨进行调查研究，于1983年出版了《盘村瑶族》一书，反映了“过山瑶”从游耕到定居的状况。1986年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出版了《瑶族研究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吴永章的《瑶族史》，这是公开出版的第一本瑶族史专著。199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蒲朝军、过竹主编的《瑶族风土志》，描述了瑶族社会生活及习俗。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大量的论著和论文面世，在瑶族族源、迁徙、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新观点。瑶族研究不仅成为国内外的热门课题，瑶学自身也逐渐形成体系。近一个世纪的瑶族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

### 三、瑶族民居研究现状及本书涉及的瑶族村落

目前国内关于瑶族民居的研究不多，主要散见于各种地方民居著作，如《湖南传统建筑》《广西民居》《湘西民居》等。在日本出版的《中国湖南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居》<sup>①</sup>一书中对瑶族的案例有详细研究。其中第七章“瑶族民居的村落布局与平面形态”，以江华县水口镇大车洞村为对象，论述了村子的布局规划、民居平面中过道的形成、堂屋平面的变迁及民居建设中使用的尺度等。特别是关于过道的形成和堂屋本身的变迁，提供了理解瑶族民居形态变化的重要线索。尽管如此，这一研究涉及的瑶族民居仅局限于大车洞村一个村子，总共只有11栋，由此对江华县瑶族民居进行把握仍然有一定难度。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对象范围，包括大车洞村、坪冲口村、黄石村以及桐冲口村共28栋民居，加上第二次调研所测绘的8栋瑶族民居，合计共36栋民居。两次调研的瑶族都属于“过山瑶”<sup>②</sup>，语言上使用瑶族的“勉语”和汉语两种。根据当地文保部门的介绍，这几个村寨是江华县具有代表性的瑶族村寨。这里先介绍所调研村寨的概况（图1-2）。

横江村（图1-3）位于江华县南部的两岔河乡。十几栋民居分散在山间，对外交通不便，加上土地贫瘠，村子的经济状况不好。但另一方面，横江村保留了瑶族相对古老的生活习惯，

<sup>①</sup> 土田充义，杨慎初，中国湖南省汉族と少数民族の民家 [M]. 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03.

<sup>②</sup> 调研的瑶族所属分支由当地居民及江华县文化局文物所告知。